

草木散记

枇杷桑葚 壬寅布谷

何频

今年的天气还不正常。3月里春花争放,但气温忽高忽低像过山车一样。4月有两回高温攀过三十度,旋又戛然而落,秋衣去了再穿上。更可恨立夏过后,意外遭遇“五月寒”,使人手忙脚乱,不知所措,无奈重拾秋衣和厚外套。老天!郑州这些年,不是这样的呀。

植物不顾人而自行其是。一春天草木花果气定神闲,依次登场亮相,一个也不落下。国家气候中心的解释是,4月以来平均气温并不低,只是波动大。仅4月下旬,就有三次冷空气经过我国,属1961年以来气温波动之第二大。

今岁又是“三月樱桃,二月牡丹”。3月末是农历的二月底,牡丹花就大开了。因为防疫,今年的第40届洛阳牡丹节声明推迟一年举办,可谓史无前例。除了牡丹,河南还有梅花玉兰,樱桃桃桑树,枇杷桃李,月季石榴,等等,自然美景,美不胜收。

“前不栽桑,后不栽柳,门前不栽鬼拍手”。城市人不信这个。小区公寓楼住户稠密,门洞前后属谁家?甘草居在一层靠着东院墙,除了一架二十多年粗如象腿的老藤大紫藤,南北二边的苦楝树和夹竹桃,分明已是二代树。咱家还有盆栽三株树——红梅蜡梅各一,和一株果桑。

毛诗记桑树多多——《曹风·鸣鹤》:“鸣鹤在桑,其子在梅。”《小雅·桑扈》:“交交桑扈,有莺其羽。”鸣鹤若是斑鸠,黄莺如果是黄纹绿毛翼的白头鸭,状描恰如其分,此和两千多年前的树木飞鸟,诗情画意依旧契合。冬天的僵硬被化解后,春来桑树叶叶并出,落花而结实,由小变大,逐渐到谷雨立夏,桑葚染红变紫,每天朝敬初上霞光涂满果树,绿映红煞是美观。早早开门出门,我总看见灰喜鹊和白头鸭争着在树头上吃桑葚,它们很顽皮,无顾忌,边吃边糟蹋。其下双鸠于行动觅食,悠闲吃现成的一地落果。《卫风·淇》:“桑之未落,其叶沃若。于嗟鸠兮,无食桑葚。”它怎么不吃?

鸠在毛诗中出现的也多。读《毛诗品物图考》一类的博物志和注解,鸣鹤何?斑鸠还是鸣鹤,戴胜还是布谷?各家各执己见,至今也没有统一的说法。好在吧,这几只鸟现在郑州都有,戴胜由候鸟已经变为留鸟。郭沫若题画诗,戴胜入川曰凤头鸠。它是孵蛋育雏最早的。单元楼一层门洞上头,邻居安装空调打的一个圆洞是它家,春节刚过完,戴胜妈妈天天早上冉冉飞翔,衔着食物频频归来投喂,小戴胜二三个挤着张着嘴,嗷嗷待哺。仲春之后,育雏成功的戴胜妈妈,得意地站立房顶上,轻松轻巧,一阵阵鸣叫“公公——公公”的,带回响叫个不停。随时随地,一年四季可见戴胜。其最大特点不在花冠似羽毛扇,而在于不停啄食——啄木鸟一样的长长嘴巴,磕头虫一样不住气捣地。

啄木鸟像小锤子似的敲击树干上的树皮树洞,戴胜则辛勤啄食地面上的草籽和毛虫,天生都不惧怕脑震荡。但我要悄悄告诉你,我不曾遇见戴胜在树头上觅食的情景。已故的北京画家田世光先生,有幅颇精到的小写意彩墨《同友图》,画面上就地横着一方岩石,倚着老树枯枝,上斑鸠下戴胜,顾盼互望,神采奕奕。



田世光《同友图》

斑鸠,它撒豆成兵一样眼看着在变多,和灰喜鹊、白头鸭数量泛滥差不多。它总是成双成对的,在天在地皆比翼而动,有人呼它爱情鸟;树头鸳鸯。冻鸟冬日里缩头缩脑栖息在落叶树高枝上,快到冬至的时候才开口叫。冬至而一阳生。地气升腾人不觉,却在斑鸠开口呼叫的嗓门里咕涌流动。它到处做窝,随遇而安。像大模做样的流浪猫一样,城市将其惯坏了,树上做窝不多,总是懒懒地顺水推舟,就着人家的窗台阳台,或者外挂空调机一侧做窝,俨然鹊巢鸠占。《召南·鹊巢》:“维鹊有巢,维鸠居之。”习见的珠颈斑鸠、山斑鸠之外,今年本院频现黑斑鸠。但在观鸟手册上,并没有记录黑羽毛的斑鸠。

唯独杜鹏布谷,特行独立,依然是候鸟。布谷呼应着人的情感,数那四声布谷迷人,老家人说“割麦种谷”是它。很多人闹不清斑鸠和布谷发声,包括古人,误将鸠声作鹏声者多多。我是近些年才能准确区分大布谷和四声布谷的,它们在大河两岸是一起来的,时间在5月中旬。但上海的周育建先生,有他独到的观察——

大杜鹃是春天的使者,每年4月的时候,上海南汇就会响起大杜鹃“布谷、布谷”的叫声,布谷鸟来报春了呢。说起来,杜鹃科的鸟类普遍行踪诡秘,轻易不得见,然而来到南汇的大杜鹃们却落落大方,端坐杉树上甚至海堤上。春季时往往能见到好多只大杜鹃,它们并非路过,而是在这里作为夏候鸟,求偶繁殖。《(鸟兽虫识别和观察笔记),上海教育出版社,2019年12月版)

樱桃桑葚,杏和枇杷,乃暮春初夏之郑州露天四果实。桑葚除了白甜如饴,其它和本地枇杷一样,味如鸡肋。南方来的蚕蛹模样的胖黑葚与大似鸡卵的好枇杷除外。

郑州枇杷,也是国庆节之后次第开花,寒霜露降花满树。花味道清冽而冲,似丁香与槐花味道,亦略似樱桃开花气息。立夏至小满,郑州树树黄枇

把。绿道绿廊的塑胶路上,似乎是秋深橡子落地有很多落子,这是什么——略一思索,我恍然大悟,它是路人和晨练者尝尝枇杷吐核儿所致。原来枇杷黄,个个像软枣一般大小,且酸涩不可食。现在随气候变化果实变大,味道也有改变,外形和沈周及吴昌硕、齐白石笔下之枇杷形似。

人们都以为枇杷栽种是近些年的事,其实,远在明代,枇杷在开封就生长良好。周王儿子朱有燝(1379-1439)是一代词曲杂剧大家,他为枇杷樱桃赋诗,且多记白头鸭。《枇杷绿使》:“卢橘冬看花,仲夏呈佳餐。上有绿衣鸟,来看金弹丸。”《题樱桃白头鸭》:“闲倚芸窗喜雨晴,石阑春暖晚风轻。绿云缭绕珊瑚树,静听枝头好鸟鸣。”此绿衣鸟和白头鸭,即白头鸭也。和枇杷相比,迟来的梅花梅树,梅子果实实演化迟缓。枇杷与杏果黄熟了,刻下惜梅子稀疏,尚青尚小。

说着说着,布谷鸟即杜鹃就要出场。贾祖璋先生说:“这样在中国文学史上极有地位,而名称繁复到有42个的杜鹃鸟,羽色,正和它的鸣声相同,有凄凉哀怨的情调。”

无独有偶。钱锺书默存先生注释宋诗,独辟蹊径,详说“鸟言”和“禽言”诗。对“禽言”诗他是这样说的——

“禽言”是宋之问《陆浑山庄》和《谒禹庙》两首诗里所谓:“山鸟自呼名”,“禽言常自呼”……同样的鸟叫,各地方的人因自然环境和生活情况的不同而听成各种不同的说话。模仿着叫声给鸟儿起一个有意义的名字,再从这个名字上引申生发,来抒写情感,这就是“禽言”诗。

我们现在知道了布谷是益鸟,全靠吃树上各种毛虫而无关桑葚。但毛诗述

人,意蕴意境丰富,可资联想多——相对于古老的桑树来说,刻下麦子、中原与布谷鸟,着实三位一体。

麦与桑同样古老——《邶风·载驰》:“我行其野,芃芃其麦。”这一季的冬小麦,秋种夏收轮回,快要成熟了。去年10月半我随李佩甫大兄,一道去豫中采风访友,在郑县拜东坡谒“三苏坟”,同时看乡村种麦。此乃《周南·汝坟》原唱之地,这时因华西秋雨缠绵而种麦迟。陪同我们的老县长说,不要紧,咱们有经验加强育苗管理。随后“十一”我回南太行老家上坟,山里山外,见麦苗青青正满地。可到此为止——接下来冬春两季,包括春节清明节,这厢因为从严防疫,我没有再离开郑州,没有看大田麦生长的机会。转眼南风阵阵,樱桃桑葚次第红了,鸟儿轮番奔袭而来,但没有听见杜鹃布谷鸟叫。布谷鸟因“五月寒”而迟来吗?正常年份,5月12日至15日之间,布谷鸟鸣是一定的。

去年辛丑,春暮也是低温。4月下旬低温反复,但止于月末。新冠疫情今年会不会结束,各种预测都有。我个人不乐观,觉得气候太不正常,尚未回归平顺的年份。

风调雨顺的年景,初夏迎布谷听布谷鸟叫,平添一份人生的喜悦与欢欣。布谷或黎明或夜半之际凌空而来,其四声一度之天籁之音,倏忽挑开了换季的序幕。

布谷声又是百变之声,随时发出百姓心声。今夏布谷你叫什么?“疫走不走——疫走不走”,还是“疫快快走——疫快快走”?

布谷归来兮。布谷鸟好听的叫声,原来很奢侈!

2022年5月18日于甘草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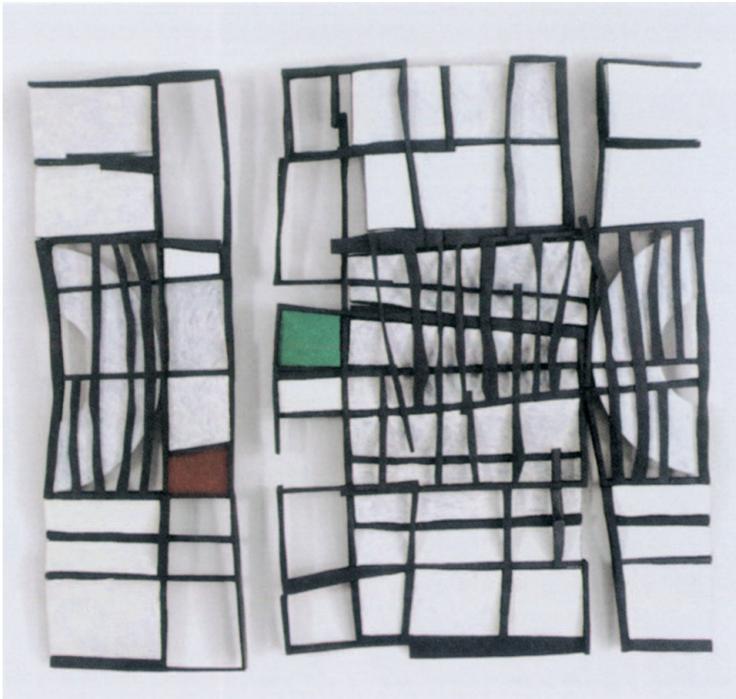
笔会

周而复始

(油画)

托尼·特维格

[澳大利亚]



天台

王文

新世纪之初,我在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区的一座县城上小学,不知网络,遑论电玩,平日最开心的是在楼下哥哥家里看录像带。那段时间风靡的电影是港片《无间道》,故事情节早已淡忘了,印象最深刻的是那场天台对决。双雄对峙,刘德华对梁朝伟邪魅一笑道:你们这些卧底真有意思,老在天台见面。

后来我在学校里不知重复了多少次这段对白,对一个小学生来说,没有比模仿黑帮片更酷的事了,虽然往往会引起对方的困惑、不屑和烦躁,直至最后被暴打一顿。迷恋电影的另一后遗症是,放学回家后经常往楼顶天台上跑。

我们住家的五层单位自建房就在史河边上,一面对山,一面迎河,视线特别开阔。那时候的天台主要功能似乎是晾晒衣物,两堵墙之间拉了几根铁丝,挂满了各家的被褥和衣物,散发一股浓烈的洗衣粉香味。到了傍晚,如无意外,一切都被收走。

我喜欢沿着天台的边缘踱步,幻想自己在和一个不存在的危险对手做交易。那一般是在下午五点到六点之间,所谓的“魔法时刻”,暮色开始蔓延,白昼的光尚未散尽,周遭的一切都不清晰。夕阳下,史河平静地闪烁着鳞片似的金光,将整座小城劈成两半,大桥上,面目模糊的行人都像是肩负着某种特殊任务。

天台上通常没有旁人,累了就在太阳能面板下面铺一张旧报纸躺下来,直至暮色四合,凉风骤起,星星在头顶逐一浮现,赶紧回家吃晚饭。有次我从地上爬起来,听到有人在不远处喊我的名字,四处寻觅不见一人,找了好久才发现声音来自对面天台。前不久刚认识的转校女生在冲我挥手,旁边是她正在取衣物的母亲。她把手交叉胸前呈喇叭状大声喊:“你在这干嘛呢?”恰是我隐约有些好感的女孩,我不清楚自己刚才怪异的举动是否被她发现,支支吾吾道:“我来看落日。”这当然是一个无比矫情的借口。女孩喊:“太阳已经落下了啊。”我转身一看,晚霞涂抹着山脊的边缘,像口红印戳在空荡荡的天上,原本垂在山谷间的夕阳果然已经消逝不见了。

但也有例外。有一天我在宿舍边吃饭边看《舌尖上的中国》,那一期节目中穿插介绍,一个在北京打工的哥们儿,因为觉得天台上的地面一格一格很像开心农场,就鬼使神差地偷偷种起了菜,起早贪黑辛勤劳作,竟然得到了物质和精神上的双丰收,中年危机都被消解了。此处的天台,是喧嚣都市生活中一格珍贵的自留地,埋头在天台种菜,和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并无区别,哪怕抬头看到的不是南山,而是南山大厦。不过,现代社会的逃离与宣泄都要付出极大的成本,能上天台的人,肯定也不容易。

把天台这个“桃花源”意象用到极致的大概是周杰伦自导自演的《天台爱情》,正如片名所预示的,这就是一部完全在天台上发生的架空故事,就和《海上钢琴师》一样,电影里的人物从未也不愿离开天台。他们以为“上有天堂,下有天台,这里是离星星最近的地方,许的愿都比较容易实现”。

但,能许下什么愿望呢?都市人的生活大多循规蹈矩,鲜有奇迹发生。如一定要许愿,大概只能是“无忧”。昔日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在柏林郊外兴建“无忧宫”,将荒芜的山丘开垦成六块梯形露台,栽上葡萄藤和无花果。近三百年后在北京天台上种菜的哥们儿应该是“社畜所见略同”吧。

去年底来到澳门工作,从暖温带气候一头扎进亚热带海边,羽绒服换成了薄衫。气质完全不同的岭南生活似乎也验证了我前对南北天台作用的猜测。

那是东望洋山南麓的一栋小楼,五十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汪洋,因为不断填海始成陆地。小城的空气非常湿润,掺杂着盐分和腥味的海风日复一日上岸,侵蚀城市里的每一栋建筑,未经保养的墙面很快会覆盖霉斑。家里的除湿机终日长开祛湿,不到一天就能储满一大罐水,也不知道这些水分是如何偷偷潜入门窗的。

为了最大程度利用日照,早起后把昨晚洗净的衣物拎到天台,在架子上一字排开,还得用防风夹固定好。晾完衣物后,抬头看东望洋山上的灯塔,以及悬挂于塔前的十字架——一开始以为是宗教场所,后来方知是台风天悬挂风球所用,看着看着会突然感到晕眩。这座小城竟是如此广阔,下面就是鳞次栉比的街区,无数骑楼、街坊、霓虹招牌、小贩推车、绿漆的活页窗、粉漆的围墙依次排开,被清晨日光敷以一层金粉,在半岛狭小的场域堆栈出一座金钢坛城。

在海边的天台上踱步时,我恍惚又回到了童年。那个盆地小城四面环山,让我一直困惑山后面是什么。此处亦复如是,在四处高楼的罅隙之间露出一格海,而海没有界限,非要说外面有什么存在,大概都是无垠的太平洋。

从天台上鸟瞰,整座城市俯首于脚下,如巨兽栖地,铺陈开身体的每一处细节,引人入胜。内心百转千回的忧愁消散于局内人忽然就变成气闲神定的旁观者。都市人的生活总被某种辽阔的屏障所包围,让人以为无法逾越。在天台上虽然不能逃离于此,但至少可以获取喘息的一瞬,也算是一种消极的抵抗吧。

去年年末,“复旦旧书店”开张,引来网上一片唏嘘。当很多书店风生水起之时,复旦旧书店老板张强还是第九宿舍门口一位废品回收者;当不少书店撤走、关门、倒闭之时,张强已然是在“复旦的书店”的最后守望者之一。从摆地摊卖旧书到自己开旧书店,并把书店命名为“复旦”,进而名扬天下,张强显得有魄力、有底气,自信满满。有人说他是“孤勇者”,其实他一点也不孤独——没有读者的支持和复旦的宽容,他不可能有勇气走下去。今天,人们怀念复旦旧书店,其实也是在怀念“复旦的书店”,怀念那个年代校园周边的书香。最后,祝复旦旧书店早日回归。

2022年1月18日

上海有复旦书店,已近一个世纪。1928年,北四川路横浜桥旁,就有一家“复旦书店”。它不是卖书店铺,而是出版机构。与复旦书店同一时期的,还有光华、新月、真善美、萌芽、嚶嚶、乐群和金屋等书店。

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,复旦书店有其一席之地。王统照的短篇小说集《号声》、赵景深的《民间故事研究》等,名闻遐迩,均由复旦书店出版。1928年夏秋,徐霞村到复旦书店当编辑,主编《熔炉》月刊。他兼收并蓄,邀约各种风格、不同流派的作者撰稿。丁玲、胡也频、戴望舒、沈从文、赵景深、杜衡和姚蓬子等,都是《熔炉》的撰稿人。丁玲的小说《自杀日记》、胡也频的小说《父亲和他的故事》,就是在《熔炉》上发表的。一时间,复旦书店出版的《熔炉》,洛阳纸贵,广受好评。

不过,复旦书店与复旦大学没啥关系,正如光华书店与光华大学无关一样。复旦书店的后台老板,是国民党改组派。改组派头目陈公博曾倚靠复旦书店,创办《革命评论》,标榜既反国民党“腐化”,也反共产党“赤化”,鼓吹“在夹击中奋斗”。因与蒋介石齟齬,1929年,复旦书店被当局查封,从此,“复旦书店”之名销声匿迹。据说,1936年在江湾复旦前后门,共有书店五家。有一家吉士书店,“以女招待吸引顾客,生意特别兴隆”。(《一根《复旦杂碎》》,1936年3月16日《申报》)那么,这家“吉士”究竟“兴隆”到什么程度?另几家书店又如何经营?因无更多史料,不得而知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:这五家书店,均不以“复旦”命名。

“复旦书店”再次出现,是在我1978年考进复旦以后。那时,老教学楼下的一间教室(今第一教学楼1109室),曾开过一家小书店。这书店,是上海新华

书店开在复旦的门市部。因是临时设置,设施简陋;地板年久失修,踩上去嘎吱作响;店内有几只老式柜台,却没有像样书架;那些拆包或未拆包的新书,就堆放在课桌上。那时,正值粉碎“四人帮”后的图书出版井喷期,各类新出、再版或重印的书如雨后春笋,几乎天天上市,深得学生青睐。因此,小书店里,也就常常人满为患。一到课间休息,学生们争先恐后,涌入书店,店内便沸腾起来;直到上课铃响,人群才会散去。有一次,因为新到了《书剑恩仇录》,店里被围得水泄不通,那几个柜台,简直要被挤翻,连上课铃声,也没能“驱散”抢购的学生。因为读者多、店员少,这里不讲究“购物体验”,一手交钱,一手交货,买书就像买菜。记得有一天,我们正在楼上1224教室上“日本史”课,讲课的好像是吴杰先生,正讲到偷袭珍珠港的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,不知谁嘀咕了一句:“楼下在卖《山本五十六》……”一下课,班上一位同学就冲进小书店,对着那位戴眼镜的店员喊道:“来一本《山本五十六》!”银货两讫后,他即突出重围,返回教室。待坐定,仔细一看,却傻了眼:这哪是《山本五十六》,明明是一本少儿图书——《365夜》!

1981年12月,小书店迁到了校门内侧平房(今为中国银行复旦支行)。店面

虽不大,却终于有了一点书店模样:进门是柜台,柜台后面是书架,书架上陈列着新到书籍,分门别类,排列整齐。此时,虽然“抢购风”不再,但生意依然红火。最抢手的,是商务印书馆的“汉译学术名著”、戴望舒的《人啊,人》、钱锺书的《围城》和卢梭的《忏悔录》……80年代初还没有一个个体书店,因此我敢说,这家店是当年沪上生意最好的小书店。尽管如此,小书店却很低调,从来也没见它挂过店招,更没见它打过广告,这与同时期开在校门外侧平房的外文书店(今为中国农业银行复旦支行)相比,形成鲜明对照——后者是有店招的,而且跟福州路的一模一样,是郭沫若先生手书的“外文书店”。那么,小书店呢?它究竟叫“复旦书店”,还是叫“新华书店”?我一直没搞明白。前几天,我翻箱倒柜,找出几本当年买的图书,猛然发现,在书的封底,盖着紫色印章,印章上的图案,是复旦物理楼和本一打开的书,上面写着六个字:“复旦新华书店”。

90年代中期起,复旦周边,各类书店遍地开花。除了国营书店外,还有个个体、民营书店,有卖综合类图书的、卖学术书的、卖外文书的、卖教科书的、卖折价书的,甚至还有卖音像书的,屈指数来,不下十家。1998年春,我已在《申江服务导报》供职,曾特别策划过一个专题

读史老张

“让我们坐拥书城”,刊登在“择业广角”版面上。其中一节,是写国权路鹿鸣书店“姓顾的老板”的开店经验:怎么选书、怎么卖书,怎么察言观色留住读者;“即使其他书店有同样的书,他们也会到你这里来买”……一位报社老总在看这个版面时,大为欣赏。我至今记得他写的清样点评,个性洋溢:“等我退休后,与你一道开书店!”

大约在2005年前后,政肃路旁开过一条复旦步行街,人气很旺。步行街只有几十米长,设有便利店、小吃店、西餐社、服装店和照相馆等。其中,并非开着的两家书店(学人书店和庆云书店),几乎带走了步行街一半的人流。学人书店着重推荐学术新书,我家里的全套“现代稀见史料书系”(东方出版社出版),就是在该店购买的;庆云书店原先开在国权路上,是一家比较高端的打折书店,图书品相好,价格实惠。它的内部装潢,最引人注目:两边是木扶梯,步上扶梯,便是阁楼,从阁楼上俯瞰全店,真有“一览书山小”的感觉。几年后,我女儿初学艺术,做了一个“庆云书店”模型,我用手机随手拍了照片,晒在微信上,竟引来无数点赞。

除了上面提到的几家书店,我记得,还有大众、古月、志达、大学和笃志等书店;我还记得,国权路文科图书馆旁

